

人文经济学研究的视角转换与时代使命

——基于文献的考察

胡文木^{1,2}, 罗智芸^{1,2}

(1. 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浙江省委党校研究基地;

2. 浙江省委党校人文经济学研究中心)

摘要:当前,关于人文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呈现经济、文化、文明三种视角。经济视角的人文经济学旨在以人文精神矫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偏向;文化视角的人文经济学则突破了单一经济视角,主张文化建构经济社会的意义;文明视角下的人文经济学则重在克服前两者隐含的文化与经济对立,真正实现文化与经济的辩证统一。上述3个研究视角总体上呈现经济-文化-文明不断递进的动态演进轨迹,其中,后一个视角始终保持着对前一个视角的纠偏和完善,这是构成人文经济学研究视角转化或演进变化的内在依据。但总体而言,学者们更多期冀达成关于人文经济学的概念共识及与之匹配的分析框架,却未能充分关注其在具体实践中的动态适配过程。因此,推进人文经济学研究应超越概念解释之争,不仅要立足人文经济学的文明高度,更要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出发,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围绕实现发展从规模速度迈入质量效益驱动、从要素红利转向创新动能、从外向依赖转向内外循环协调的目标,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改革要求、遵循“两个结合”的根本方法,系统探究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及实践进路。

关键词:人文经济学;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经济;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

经济学的本质是对稀缺资源进行有效分配,其中的“有效”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最好地利用有限资源,二是最有效地满足人类发展需要^[1]。这一思想揭示了经济学的价值逻辑——经济效率不仅关注资源的优化配置,更核心的目标是提升人类的经济福祉。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高度发展,人的异化现象也日益加剧,这个状况决定了西方经济学绝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当成为主导,西方经济学只能是借鉴”^[2]已成为国内学者的普遍共识。以习近平

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为关键节点,学者们的研究重心从论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创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逐步迈向界定核心概念、术语和范畴的新阶段。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新常态”“新质生产力”等标志性概念的基础上,“人文经济学”的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了学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方向的认识。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给江苏代表团布置了研究“人文经济学”的理论任务,学界围绕“何谓人文经济学”“人文经济学

引用本文:胡文木,罗智芸.人文经济学研究的视角转换与时代使命——基于文献的考察[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28(1):50-59.

基金项目:2024年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2024MZD013);2025年度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常规课题(25CCG13)

作者简介:胡文木(1971—),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政治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E-mail:Hwm1118@163.com

何以可能”等论题展开了广泛讨论。从研究视角来看,人文经济学存在经济、文化、文明共3个相互关联的视角:经济视角下的人文经济学以矫正西方经济学为使命,强调以人文精神改造经济,使经济均衡促进物质与精神发展;文化视角下的人文经济学则弥补单一经济视角的局限、超越学科界限,指出经济活动的意义由文化建构,其根本目的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因此应借助文化约束或引导社会运行,防止社会因功利主义走向道德滑坡。这两种视角虽各有侧重,但均隐含了文化与经济对立的主次关系——文化从属于经济抑或相反。这种认识的局限性在于倚重文化或经济,使人文经济学陷入单向回归,即以文化为卖点驱动经济或以经济为背景诠释文化,而未能真正揭示二者辩证统一的关系。针对这一情况,学界提出了要从文明视角重新审视人文经济学,认为人文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是文化建构人的主体性、文化引领经济,经济活动和社会生产作为载体,物化并呈现文化内涵,同时,人文经济学的实践基础是文化与经济的辩证运动,以及二者合力作用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协同并进,由此共同形成文明形态。显然,当前关于人文经济学的研究现状充分印证了其概念抽象、研究对象复杂、学科交叉融合等特性,这正是学者们难以达成概念共识的主要原因。或许人文经济学提出的背景正是由于其是一种应用于具体情境中的实践智慧,寻求普适的科学范式反而会减弱其生命力,尤其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提出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等要求,更是亟须人文经济学要赋能高质量发展、倡导科技伦理,为人的安全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注入价值理性。因此,推动人文经济学研究进一步发展,一方面需要回顾多种理论视角下人文经济学研究的演进,另一方面要立足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场景。

一、经济视角: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文经济学

从经济视角认识人文经济学,学者们主要

试图分析文化或人文精神融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过程,这是基于消费文化盛行及当前文化产业发展需要的判断,因此持有此观点的学者认为人文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与文化(产业)经济学划等号。在国外,文化资本被定位为调节市场供需关系的工具性要素,哈耶克、熊彼特、舒尔茨、韦伯、布迪厄等都极为重视文化的经济价值,分析精神资本作用于经济运行并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凡勃伦称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为“‘文化的’经济学”^[3]。在国内,也不乏将文化与经济有机结合进行思考的学者,如厉以宁所著的《文化经济学》重点考察了文化贯穿经济发展全过程,强调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是其区别于其他行业的显著标志^[4]。但不同于文化经济的使命是为实体经济增添文化附加值,除考察文化产品、文化产业、文化事业的一般属性,人文经济学更加关注文化社会效益的特殊属性。基于这一点,学者们主要从彰显经济学的人文意识、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范式两个角度研究人文经济学。

1. 多重角度论证人文经济学的人本取向

以1979年国际文化经济学会第一次国际会议的召开为标志,经济学回归人本主义的趋势日益显著,而中国则通过践行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实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在此背景下,适时总结并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所彰显的中国经济人文关怀与社会价值追求的标志性概念,不仅能丰富经济学之所以是社会科学合法性论据,更能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学者们认为,人文经济学的提出实质上是对经济学被遮蔽的人文精神、人本初心和人文价值的重新审视,是回归到以关注人类福祉为终极关怀的学术本真。目前,论证人文经济学人本内核的视角有以下4种:一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学者们援引恩格斯“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经典表述^[5],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系统阐释了文化与经济辩证统一的关系,据此说明经济是人类活动的基础,文化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二者构成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二是从历史发展的角

度,追溯了西方经济学从孕育于人文道德传统,到逐渐偏离又最终回归的演进轨迹。这一历程表明,当代经济学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要求重振社会规则具有的激励、协调、承诺、信号四大基本功能^[6]。三是从经验验证的角度,基于对全球幸福感缺失现象等的观察,指出“人”才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深层因素,原因在于人的生存生活方式制约着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结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道德等文化因素更从根本上制约着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7]。四是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认为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双重特质^[8],这种双重属性决定了经济学研究必须实现实证分析与价值关怀的统一。

2. 建构人文精神统摄的高质量发展范式

在破解“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这一世界性难题时,西方经济学强化了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中的重要性,政府常常被指责干预过多。西方这种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推崇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忽略个人追求私利与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张力的行为恰好落入了西方经济学者所警惕的“合成谬误”。国内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从根本上确立了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人文经济学提出的“什么是好的生活”以及“如何实现美好生活”的重大命题,鲜明地传达了美好生活为人民,美好生活标准由人民定的观点^[9]。以此为基调,区别于资本驱动、以创造财富为主要目标的西方发展模式,人文经济学强调人文精神融入经济全过程,包括以人为主体的,从人的立场和生活经验出发研究市场,关心人在市场中的行为、追求、限制及人际关系等^[10];以人为方法,从主体性的视角去理解经济活动,从人文视角审视发展的质量,解决传统经济学注重发展规模与速度而没有顾及“好不好”的问题^[11];以人为目的,赋予经济活动更多人文主义色彩,将增进人类福祉作为经济的最高使命^[12]。在人文精神为内驱动力的前提下,经济活动才更具有公共性和包容性^[13]。

从经济视角讨论人文经济学的学者,抓住了“文化经济”这一核心概念,深刻认识到文化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通过这一视角,能够清晰地认识到人文经济学兴起于

“物质经济过剩”、作用于文化产业。但是在此视角下,人文经济学的着力点在于凸显文化对经济活动的道德制衡而相对忽视了对“文化是什么”这一基础问题的探讨。如此一来,人文经济学所倡导的“由物到人”的逻辑转换就缺乏理论上的深层次思考,甚至会形同于西方经济学史上屡次象征式复现的人本主义回潮,即经济活动始终服务于资本增殖。

二、文化视角:建立彰显文化自信的人文经济学

学者们从文化视角认识人文经济学时,人文经济学不再被视为经济学的分支,其研究对象也不再局限于文化如何作用于经济范畴,而是被看作一种分析范式——强调以文化对经济进行批判和规范,这是在二者互为独立整体的前提下,以“大文化”反思“大经济”的方法。前文分析表明,经济视角下的人文经济学主要探究文化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这一研究路径与西方经济学通过价格信号、激励机制等间接影响经济人行为的方式并无本质差异。尽管在此语境下,文化或人文精神被赋予修正西方经济的使命,但单纯依靠复兴人文精神,显然难以根治西方经济的结构性痼疾。因此,文化视角下的人文经济学就需要进一步超出经济范畴,借助文化破解经济发展与人的解放之间的深层矛盾。关于以何文化为思想基础,学者们纷纷认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主要观点如下:

1. 阐释人文经济学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

经济学的理论旨归是使人在必要的物质基础条件下,实现人的能力和价值,然而现实却将人置于物的逻辑支配下。对此,学者们普遍认为,人文经济学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解决现代经济学中“人的异化”问题提供了独特思路。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思经济发展道路,将经济活动还原为人文关系,为打开经济学的封闭空间创造了可能: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是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是系统的调节主体,前者作为发展力量,侧重提升市场效率;后者作为调节力量,引导可持续发展,体现了人文精神具有工具

性价值增值与目的性价值规约两重尺度^[14],这种双重属性为解决“文化-经济”对立提供了新思路。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体地位。文化与经济交融互促涉及本体关系,人文经济学确立了文化为本、经济为体^[15],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伦理、文化资源及塑造的人力文化素养转化为重要的文化资本,形成了区别于西方物化逻辑的价值储备^[16]。三是厚植人文经济学的文化根基。人文经济学最独特的优势就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思想基础,“以人为本”“仁爱”“和谐”等理念为建构人文经济学的中国话语提供了思想底蕴和理论基础^[17]。深厚的人文底蕴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的创新驱动动力,既能作为生产要素直接参与价值创造、作为创新力量培育新业态、作为文化制度降低交易成本,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又通过资源反哺、技术赋能和需求升级等进一步丰富了文化内涵。因此,推动人文经济共生共荣的实践逻辑,要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定文化自信。

2. 探究文化自信赋能产业繁荣的作用点

近年来,奉行绝对市场崇拜的西方文化产业频遭趋同化、庸俗化、垄断化的质疑,“欧美文化全面崩盘”“被‘炒冷饭’困住的西方文化”等评论屡见不鲜。西方“文化重复”与产业颓废的困局,实则暴露了其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衰竭,而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正是西方经济“见物不见人”的理论缺陷——资本逻辑主导的发展模式,最终导致了人文缺失、人文悖论及人文危机。在这里,“见物”是因,“不见人”是果,而只“见物”不仅指西方经济学家将研究局限于资源配置范畴下人与物、人与人的表象关系^[18],更意味着其刻意回避了“谁掌握经济权力”这一本质问题,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公有还是私有。这种对“人”的忽视,使得西方文化产业在资本逐利中逐渐偏离人文本质,难以持续支撑创意经济的发展。反之,文化自信赋能中国文化产业繁荣的作用表现为:一是以制度优势锚定产业发展方向。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为文化产业的繁荣奠定了根本性制度支撑,中国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始终以文化自信为深层引领,而人文经济学的实践则成为文

化自信赋能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凸显出中国市场经济“见物”更“见人”的独特优势。二是以健全伦理塑造产业发展生态。文化自信蕴含的中国文化底色推动人文经济学构建起健全的经济伦理,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平衡效率与公平,能破解“增长与福祉”的悖论。三是以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激活产业价值。文化自信是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的价值根基,为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提供了精神底气,而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又进一步推动了文化产业实现从规模扩张到内涵提升的跨越^[19]。

从文化视角认识人文经济学的学者们,使人文经济学成了一门实现科学与人文、市场经济与人文精神、自利与利他的多重统一且突破传统学科界限的综合性学科;在学科定位上,人文经济学构建了文化与经济共生的互动框架^[20];在理论范式上,人文经济学超越了经济增长导向、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21];在方法论上,人文经济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22],通过创造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实现了文化引领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23]。但是,人文经济学如若仅仅依靠文化、人文精神等象征道德的力量来规范市场运行却忽视市场调节、法律力量等,则多少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色彩^[24],使得其在回归人文主义的同时被置于脱离具体实践场所的境地。

三、文明视角:建立文化-经济互促的人文经济学

显然,在经济和文化视角下,人文经济学被一般地视为讨论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的理论现状,极易引起人文回归经济或经济回归人文的单向回归^[25],使得人文经济学越发远离以经济与文化的融合发展推动协调发展的时代定位。因此,有相当部分学者试图糅合这两个视角的优劣,从而提出要从文明的视角认识人文经济学,即人文经济学展现了当前中国社会发

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26]这段话说明文化无好坏,文明有高低,研究人文经济学既要将其视为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范式,突出人文经济学人的主体性特征,把人作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目的和依据,是一种“人本经济”的经济体系^[27]。同时,人文经济学研究也要从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融合发展的动态中把握其“未来学”的定位,以更好地揭示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机制的文明价值。

1. 人文经济学的理论面向:是超学科范畴的文明型发展模式

从文明视角认识人文经济学的学者们,避免了单一学科的视角,并力图区分人文经济学与文化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异同,旨在说明人文经济学作为一种文明范式,从属于具有人类文明新形态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首先,人文经济学的着力点既不是经济,也不是文化,更不是跟进西方经济学,而是基于中国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文化视角的人文经济学和经济视角的人文经济学,探讨的仅仅是产业发展新亮点和经济转型新方向,尽管重点是从文化和经济的视角去审视所有的经济现象,探讨并揭示经济现象中的文化因素、文化现象中的经济因素及文化和经济的互动规律,但从本质上来说,这些研究均隶属于经济学学科范畴。其次,人文经济学呈现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价值。偏狭地凸显文化的经济价值或经济的人文价值,都是一种缺乏整体性视角下的片面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学的重要论述表明,人文经济学理应聚焦于文化与经济如何良性互促发展这一宏大命题,而这一命题无论从方法论基础或价值取向而言,都属于文明的范畴。概言之,人文经济学的实质就是追求人文价值共享经济利益的和平发展模式,这是一种“人文化成”的和平发展理念^[28]。最后,人文与经济是文明的两大基础力量,二者辩证互动形成的合力即文明形态,由此,“人文经济学”的语义结构是“人文-经济”学的并列结构^[29],其逻辑构架是“文化-人-经济”的一体贯通^[30]。在“人文-经济”辩证互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宏大视野下,人文经济学需要解答文

化与经济“为何”(历史成因和主要机理)、“怎样”(融合可能性和路径选择)、“什么”(结合样态)等规律性问题,由此才能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视角着力推动话语体系创新。

2. 人文经济学的实践面向: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方略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基于这一现实逻辑,相当一部分学者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人文经济学:首先,人文经济学视阈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发展动力和制度保障,能够精准识别当前发展的现实特征与矛盾关系,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打通高质量发展的堵点^[31]。其次,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的人文经济学,将经济建设置于建构文明的中心地位,视经济增长为文明建设的基础,视以所有人幸福生活为目的的经济平等、财富共享为文明建设的归宿。最后,人文经济学涉及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表现出着眼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重新审视反思人类活动目的和价值准则及人类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特点。概言之,人文经济学就是一种代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方向的新发展范式^[32]。在治国理政、统筹国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人文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概括为在“经济-人文-社会”关联互动的理论框架下,经济与宏观社会结构、人文历史的本体关联、人文精神与经济活动的双向影响机制及文化活动和产品产业化的辩证关系^[33]。

从文明视角诠释人文经济学的学者们,取得了两方面的重要成果:一方面,指明人文经济学开创了世界范围内人文与经济一体的文明范式;另一方面,强调了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顶层设计的重大理念创新,人文经济学要助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文明视角的确证下,人文经济学的深刻意蕴指向新型文明范式及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基的话语创新^[34]。

四、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人文经济学研究

从上述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学界关于人文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思路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借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并溯

源西方经济学演进轨迹,指出人文经济学以人为本的精神内核;另一方面,通过区分人文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理论特征、价值旨趣等方面的差异,说明人文经济是以人文精神为牵引的经济-文化互动发展的新模式,这是独属于人文经济学的自主知识创新。因此,无论与文化经济学、人本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存在何种程度的交叉,人文经济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立足于纠偏“人”“物”错位的西方现代化模式。显然,人文经济学这一主基调说明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势必是关于社会制度与社会关系、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整体创新。如此一来,从文明视角整体性地认识人文经济学,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完成文化的实践转化,又能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上加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至此,学界基于文明认知形成的理论范式,充分证明了人文经济学文化-经济相互作用、面向现代文明的超越性。然而,“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35],意味着文明不仅是固态的历史积淀、事实判断的认知工具,同时也是动态的实践力量、人类活动的实践指南。文明是一个比较概念,往往指传统与现代、野蛮与文明、蒙昧与启蒙等关系范畴中具有进步价值的一方,这种以历史时间观为基础的实践话语,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跨越了物质积累阶段、进入注重文化强国的新时代后,更加注重确立、巩固、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并在“文明的哲学基础是德性哲学”的新知中^[36]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基于文明视角进一步深化人文经济学研究,就不能局限于泛泛而谈人文经济学的人文(文化)动力和人文(人本)取向^[37]并建立起“人文”与“经济”的贯通路径,而是需要将其置于“以中国经济现象和问题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具体要求中进行讨论^[38]。当前,把中国式现代化由蓝图变为现实,根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指明了深入研究人文经济学要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心任务,以人为坐标、构建人与人互利有益的关系模式。这样,深入研究人文经济学就不仅能为完善中国特色经

济学理论体系提供重要突破口,也能高效实现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1. 推进人文经济学研究的时代背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上文的阐述可知,在文明视角讨论人文经济学的学者们竭力避免陷入抽象地考察人的问题、或者将人文经济学矮化为文化经济学,其已认识到前者疏于将人文经济学置于现实场景中进行必要的验证,后者则难以解决更为宏观层面的价值困境。这类学者在确立人文经济学是一种新型文明范式的理论定位后,多从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建设中华文明等场景中提炼文化与经济良性互促的主题主线,这就启示我们,建构人文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立足时代之基,回答时代之问,反映时代所求。“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39]问题源自何处?来源于具体的经济活动。因此,除了将人文经济学视作理论解释的工具用于分析资本逻辑引发的社会问题,其更远大的理想乃在于“改造世界”,即要使具体的经济活动向着文明、进步和正义的方向前进。如何使人文经济学兼顾“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实现经济发展长远文明与短期野蛮之间的统一?关键在于不断推进人文经济学的时代化发展,即对中西方经济学已有的学术积累进行新的知识生产,而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承、反思已有知识;另一方面是对新问题进行洞察根源、揭示实质,形成分析框架,并对已有知识同步进行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的赋新^[40]。对于第一步,学界已形成丰硕成果,这就产生了开启第二步的急切需求: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维度解读人文经济学,认识到人文经济学实现了对现代西方经济学和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超越。至此,被置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实践场景中的人文经济学,不仅在形式上呈现为理论创新表达,同时更具有了动态的时代内涵与不断被拓展的外延。

2. 推进人文经济学研究的实践遵循: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创新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赋予了人文经济学以新的内涵和实践要求。首先,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以贯彻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将坚持制度建设为主线作为改革策略,要求改革组织方式,这些指导观念和思维构成了丰富人文经济学内涵的重要来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41]18}。新发展理念集中回答了“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指引推动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与人文经济学共享同一价值宗旨。这样,关于人文经济学在社会发展中如何有效体现及运行机理就有了明确的方向:人文经济学要为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助力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培育绿色发展理念、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等。其次,着眼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改革组织方式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其共同构成了人文经济学发展的实践场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存在着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共3个层级的制度体系。按照制度稳定性、适应性、效率化的成熟标准来看,经济体制的根本制度根基稳固,基本经济制度运行顺畅,当务之急是创新重要制度。“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创新重要制度”^{[41]21}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原则,这要求“守正创新,加强不同制度之间的集成和协同效应”^[42]。最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改革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要求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推进改革,实质上是呼唤形成一种系统的、有机的人文经济学。目前,我国正处于“加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关键时期,要重点把握“强化系统集成,加强对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高效”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41]79}。显然,“集成”“协同”是进行制度建设和改革组织方式核心理念,相应地,在认知层面提出了培养和加强辩证思维、创新思维、系统思维的要求。这些思想和工作方法的创新理念拓展了人文经济学研究的空间,要求人文经济学着力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理念和思维方式,如创造性转化“阳明学说”“物极必反”等思想,挖掘“变通”的创新基因,借鉴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整体观等。

3. 推进人文经济学研究的根本途径:坚持“两个结合”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动下,人文经济学的研究成效影响着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发展进程。如何深化人文经济学研究,除明确其核心和着力点,更需要从方法论上取得突破。“两个结合”是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深化人文经济学研究的实践途径,要围绕“两个结合”展开,具体做好四方面的工作:一是坚守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充分挖掘蕴于其中的人文精神,从多维度论证人文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二是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人文经济学的理念创新。三是推动人文与经济的有效结合。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为摆脱抽象的人本主义束缚,同时避免陷入西方产业经济学的理论误区,探讨文化与经济双向驱动相应地被置于人文经济学的核心^[43]。于是,探讨人文经济学往往围绕着诠释人文精神作用于经济过程的内在机理,提炼总结经济人文化、人文经济化相互转化和促进的基本机制、关键环节、运行规则和必由路径。但这种过度强调二者辩证互动的做法极有可能导致简单问题复杂化,原因就在于忽视了转化的前提是二者具有相对独立性。“‘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44]，“两个结合”这一观点启示我们,推动人文与经济结合的前提是筛选适用于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的人文理念,在此条件下实现经济大国与文化强国双轨建设的发展理念互补、思维方式融合、公平与效率平衡、传统要素现代转译。四是推进人文经济学的地域性转化、实现价值的空间延伸,将区域经验转化为本土智慧并上升为世界典范。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中存在文化与经济“两张皮”现象,二者难以共存,且只能以牺牲人文精神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这似乎成了发展现代文明的潜在共识。文化与经济“二律背反”的原则冲击着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上甚至被质疑为不适应市场经济。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

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45]由此就证明了文化-经济“人文悖论”是一个伪命题,揭示了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的发展规律。新时期,尤其是“十五五”规划建议要求“实施积极的文化经济政策”^[46],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就更加需要重点关注人文经济学的地方实践经验。宏观层面,要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经验,厘清文化与经济的耦合机制,在此基础上研究现代市场体系彰显或创造的人文精神。微观层面,要注重分析产业结构、布局及成功的关键因素,研究经济政策制定的理念及具体实施效果。如此,人文经济学的价值就不仅限于指导全国各地协同文化与经济发展,对世界上受制于“西化”文明侵略、苦于无法将文化转化为经济效益的国家而言,都具有借鉴意义。

五、结 语

推进人文经济学研究的难点在于:要避免将其与文化经济学等同,或抽象地讨论人文精神,前者会造成人文精神的丧失,而后者则会步入脱离现实基础的真空环境,二者都无益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造成这种进退两难困境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忽略了人文经济学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的主动性。所谓具体的历史环境,即需要从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去认识人文经济学,诠释彼此耦合的内在逻辑理路的同时指出人文经济学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与方法指引,由此能确证人文经济学作为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定位,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能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

无论是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抑或一种文明理论的分析范式,人文经济学主要取决于其是否在理论上解释了人类文明的难题,能否在实践中为破除现代化藩篱设立原则、提供具体可行的对策,是否开辟了人类探索文明的新道路。人文经济学想要开辟出一条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新路,就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的基础源自中华文明持续发展。只有在巩固文化主体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立论基础上,才能整体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古往今来”,同时在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继往开来”。

参考文献:

- [1] 萨缪尔森,诺德豪斯. 经济学:第19版[M]. 萧琛,主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4.
- [2] 刘国光. 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J]. 经济研究,2005(10):4-11.
- [3] 陈宪,主编. 经济学方法通览[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899.
- [4] 厉以宁. 文化经济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6.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4.
- [6] 张维迎,陈志武,许小年,等. 师说:人文经济学[M]. 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23.
- [7] 朱德位. “人文经济学”说[J]. 人文杂志,1997(1):58-62.
- [8] 朱成全. 人文经济学何以可能?[J]. 财经问题研究,2005(10):3-12.
- [9] 新华社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课题组.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发展范式研究[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5(1):11-19.
- [10] 茅于軾,岑科. 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5.
- [11] 鲁明川. 人文与经济相互交融推动高质量发展[N]. 光明日报,2024-07-01(06).
- [12] 黄万盛. 重续人文经济学谱系——黄万盛教授在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的演讲[J]. 珠江经济,2007(9):4-14.
- [13] 王忠,李小霞. 基于人文经济学视角的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径[J]. 南京社会科学,2024(2):38-46.
- [14] 邹智贤. 人文经济学何以可能?[J]. 哲学研究,2013(8):104-110.
- [15] 向勇. 人文经济学的基本内涵与表现形态[J]. 人文天下,2023(10):8-10.
- [16] 邵明华,高洋. 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中传统文化资本的独特价值[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6(3):11-20.
- [17] 王忠,车学森. 人文经济学研究:理论演进和话语创新[J]. 江苏社会科学,2024(2):77-86.
- [18] 程恩富. 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J]. 中国社会科学,2007(1):16-29.

- [19] 代玉启. 精神富有:人文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维度[J]. 浙江学刊,2024(6):77-87.
- [20] 任平,李扬,战炤磊,等. 人文经济学:高质量发展的人文密码(笔谈)[J]. 探索与争鸣,2023(9):144-158.
- [21] 王文姬.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推进人文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J]. 河北学刊,2025,45(2):21-29.
- [22] 高原,叶祝弟. 人文经济学:科学困境下的人文回归[J]. 社会科学战线,2025(1):98-106.
- [23] 魏建. 人文经济学为经济研究开拓新领域[N]. 光明日报,2024-07-09(11).
- [24] 梁碧波,李永杰,周怀峰. 人文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演进轨迹和发展趋势[J]. 江汉论坛,2008(1):16-19.
- [25] 王立胜,段博森. 论文明学维度的人文经济学[J]. 人文杂志,2025(4):1-10.
- [26] 习近平在江苏考察时强调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 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N]. 人民日报,2023-07-08(01).
- [27] 罗卫东.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经济属性[J]. 浙江社会科学,2025(1):28-41.
- [28] 魏鹏举. 中国发展的文化自觉:人文经济学之引入[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25-33.
- [29] 樊浩. 人文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学”?[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26(1):5-14.
- [30] 洪银兴. 人文与经济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人文经济学[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5,62(1):5-18.
- [31] 顾江,石志如,疏慧娟. 人文经济学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机制与战略布局[J]. 社会科学战线,2025(1):71-82.
- [32] 任平. 人文经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创新的重大议程[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6):1-11.
- [33] 胡承槐,顾青青. 人文经济学的概念、对象、方法及其实践性、科学性[J]. 浙江社会科学,2024(6):18-26.
- [34] 樊浩. “人文经济学”如何是一种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3):14-25.
- [3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7.
- [36] 韩庆祥. 论文化和文明的相对区别及其重大意义[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2):1-14.
- [37] 陈立旭. 理解人文经济[J]. 浙江学刊,2024(6):66-76.
- [38] 林毅夫. 关于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思考与建议[J]. 大学与学科,2021,2(3):17-26.
- [39]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0.
- [40] 孙正聿. 怎样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知识生产的理论思维[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60(6):5-11.
- [4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42] 孟捷. 从新发展理念到改革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学习领会二十届三中全会文件精神[J]. 政治经济学研究,2024(4):16-21.
- [43] 桑明旭,徐星美. 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唯物史观基础[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5,39(1):126-140.
- [44]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3-09-01(01).
- [45] 杜尚泽,潘俊强. 总书记关注的这个题目,有中国的未来[N]. 人民日报,2023-07-10(01).
- [46]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27.

A Shift in Perspective and the Mission of the Times in the Study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A Literature-Based Investigation / Hu Wenmu^{1,2}, Luo Zhiyun^{1,2} (1. Research Base of Party School of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Research Center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n Zhejiang Province; 2. The Humanistic Economics Research Center,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Abstract: Current research on humanistic economics primarily adopts three perspectives: economic, cultural, and civilizational. Humanistic economics from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 seeks to rectify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bias of mainstream Western economics through a humanistic spirit.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it moves beyond a purely economic viewpoint to emphasize the role of culture in constructing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From the civilizational perspective, it transcends the implicit opposition between culture and economy inherent in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aiming to achieve their dialectical unity. These three perspectives generally follow a dynamic evolutionary trajectory—from economy to culture to civilization—where each successive perspective critiques and refines the previous one, forming the internal logic behind the shifts in research viewpoints within humanistic economics. However, overall, scholars have focused more on reaching a conceptual consensus and establishing a corresponding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humanistic economics, while paying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its dynamic adaptation in specific practice. Therefore, advancing research in humanistic economics should go beyond conceptual debates. It is essential not only to ground such work in the civilizational perspective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but also to proceed in the context of furthe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By closely aligning with the them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ncentrating on transitioning from scale- and speed-driven growth to quality- and efficiency-driven growth, from factor-driven advantages to innovation-driven momentum, and from external dependency to enhanced coordination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circulations, while implementing the reform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and adhering to the fundamental methodology of “integrating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realities and it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we can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and practical pathways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Key words: humanistic economics; Chinese 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y;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